亚洲寻求共同发展

——访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

本报记者 翁东辉

探讨亚洲共赢之道

有必要重申“亚洲寻求共赢”的精神，寻找利益的共同点和汇合点，超越分歧，共同发展

记者：一年一度的博鳌亚洲论坛很快就要召开了，2013年年会的主题是“革新、责任、合作：亚洲寻求共同发展”，您怎样阐释这个主题？本届年会的亮点是什么？

周文重：进入2013年，世界经济前景依然不容乐观，各主要经济体的复苏道路并不平坦。国际金融危机最艰难时刻激发出的“同舟共济”精神，时时受到保护主义等不和谐声音的干扰。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重申“亚洲寻求共赢”的精神，寻找利益的共同点和汇合点，超越分歧，共同发展。

基于这一考虑，经广泛征求论坛发起国、会员、战略合作伙伴、媒体合作伙伴的意见，并经论坛理事会批准，2013年年会的主题确定为“革新、责任、合作：亚洲寻求共同发展”。年会将着重探讨亚洲共赢和共同发展之道，希望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共同行动起来，以革新的勇气、负责任的方式，促进亚洲经济合作，推动亚洲区域合作的深化和世界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复苏。

相较于以往年会，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有以下几个亮点：

一是世界各国和地区更加重视今年博鳌论坛年会。2012年以来，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很多国家都完成了最高领导层的换届。同时，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未能根除，世界经济实现复苏之路仍然漫长。在此背景下，不少国家都表示希望通过博鳌亚洲论坛这一经济盛会对未来发展道路进行深入探讨，并积极开展高层外交。届时，来自亚洲、非洲、拉美、欧洲、北美的多国领导人将出席年会开幕式和有关分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已邀请东道国领导人出席，并与企业家代表对话。今年出席论坛年会的各国领导人数量超过以往历届年会，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论坛的重视和肯定。

二是年会议程紧扣“共同发展”主题。今年年会议程集中突出了“共同发展”这个主题，相关合作与交流的分会共有16个，包括“全球复苏与亚洲的共同发展”、“共同发展：青年领袖的责任（青年领袖圆桌会议）”、“小而美：中小企业的成功道路”、“新兴经济体：跨越‘成长陷阱’”等。

三是年会会议数量有较大幅度提高，形式创新，总的方向是更加小范围，更加互动，更加多样化。今年年会共有50余场活动，比去年增加了四分之一，其中包括18场分论坛、15场圆桌会议、6场闭门讨论、5场名人对话、1场夜话、4场午餐讨论、2场晚餐会。此外，还有开幕式和闭幕晚宴以及大量的小范围讨论，比如政府部门负责人与企业家之间的小范围早餐会，嘉宾和代表自发组织的讨论、酒会等。

四是年会演讲嘉宾和参会代表均为亚洲和域外有关国家的政学商各界精英。2013年年会将只采取论坛邀请的形式，不再接受非受邀代表报名，以提高参会门槛和参会代表的质量。企业仅限于财富500强跨国公司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行业领军企业，并以董事长、CEO等企业高管为主。优秀的中小企业，如果是细分市场的领军者，也在应邀之列。

结构调整是全球性趋势

结构调整与转变发展方式，是亚洲各经济体面临的相同、紧迫而具有长远意义的挑战和任务

记者：请您具体谈谈亚洲的发展问题。如当今亚洲发展最关键的几个要素，以及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作为亚洲大家庭一员，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周文重：总体上看，亚洲经济发展在全球经济中表现突出，特别是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亚洲经济不仅表现出了很强的抗冲击能力，率先摆脱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走向复苏，而且在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中，地位显著上升，正在成为继美、欧、日之后，世界经济增长的“第四极”。最近几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态势显示，亚洲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

但是亚洲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正面临日益复杂的挑战。一方面，美欧日发达经济体作为世界经济的传统发动机，短期内难以全面复苏，这意味着亚洲海外市场疲软将常态化，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亚洲各经济体，必须调整海外市场结构，开发“新边疆”，特别是要加快发展亚洲区域内以及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亚洲各经济体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高增长后，自身结构性矛盾与制约日益突出，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尽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结构调整与转变发展方式，是亚洲各经济体面临的相同、紧迫而具有长远意义的挑战和任务。

今年中国将进一步加快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换的进程。鉴于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在亚洲经济中的分量和重大影响，中国集中精力搞好自身的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的转换，特别是大力推动内需，鼓励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就是对亚洲乃至全球经济的最大贡献。

事实上，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结构调整已成为全球性趋势。如果中国能够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占据全球结构调整大潮的前沿，必将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再调整、对中国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产生深远的战略影响。

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将于4月6日至8日在海南博鳌召开，主题为“革新、责任、合作：亚洲寻求共同发展”。 新华社发

提出发展解决方案

博鳌亚洲论坛以亚洲经济合作为宗旨，围绕“发展”这篇大文章，通过观点碰撞，产生新的思想和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今年年会一方面将积极传递“共同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形成以“共同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亚洲声音、亚洲思路和亚洲观念，同时继续做好不同经济体合作共赢这篇大文章

记者：博鳌亚洲论坛作为一个政府要员、商业领袖和知名学者间的高层对话平台，历届年会在凝聚亚洲共识、传播亚洲声音、促进亚洲合作，应对全球性经济挑战方面，产生了不少创新性思想，也催生了一些政策的出台。请问在新的一年里，面对各种复杂形势，论坛将如何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周文重：博鳌亚洲论坛以亚洲经济合作为宗旨，认为更高程度的经济一体化是推动亚洲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正是基于这一信念和使命感，论坛成立以来的历届年会均以发展为主线，以合作为基调，以共赢为目标。我们从历年年会的主题就可以看到这个鲜明的特色，从“开放的亚洲”、“亚洲的新角色”到“绿色亚洲”、“包容性发展”、“创新与可持续发展”，都是围绕着“发展”这篇大文章，通过观点碰撞，产生新的思想和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论坛2003年年会的主题“合作促进发展”和2004年年会主题“开放的亚洲”强调了论坛的中心任务是促进亚洲发展，论坛自身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的。在全球日益关注亚洲发展的大背景下，论坛2005年年会主题“亚洲的新角色”希望为亚洲确定一个鲜明的角色定位。以“亚洲的新机会”为主题的2006年年会通过对亚洲在能源、创新、贸易投资等领域面临的新机遇进行讨论，进一步展现了博鳌亚洲论坛的务实作风。2007年年会主题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2008年年会主题为“绿色亚洲：在变革中实现共赢”。以“经济危机与亚洲：挑战与展望”作为会议讨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是当年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后，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又一次重要对话。

2010年，年会以“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为主题，呼吁亚洲各国果断进行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2011年年会主题是“包容性发展”。这一年，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亚洲各国各地区都在思索原有的发展模式，如何为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是亚洲各国各地区需要共同研究的重要议题。以“变革世界中的亚洲：迈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论坛2012年年会集中讨论了亚洲各经济体如何在快速和深刻变革的世界中，转换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冲减欧美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形成了广泛共识。

当前，国际经济与政治体系进入历史性的过渡期，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均面临结构性改革的重任与难题。在国际秩序的过渡期和全球性变革的大浪潮中，博鳌亚洲论坛一方面将通过今年年会积极传递“共同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形成以“共同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亚洲声音、亚洲思路和亚洲观念，同时继续做好不同经济体合作共赢这篇大文章。

2013年，论坛还将继续办好“亚洲自贸区研讨会”、“博鳌青年论坛”等专题会议，推动亚洲各界人士在贸易投资自由化、青年发展等重要领域的交流。论坛秘书处正在筹划第二届亚洲金融合作会议，并初步考虑以构建亚洲基础设施金融机构为主题，争取形成推进相关领域合作的路线图。

国际货币体系需要改革

美欧日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还会持续一个时期，流动性的加大必然促使国际货币汇率体系发生结构性变动甚至动荡，我们应该积极推进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改革，从制度上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和健康运行

记者：目前欧洲债务危机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威胁之一。您怎样看待欧债危机的？

周文重：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基本判断，就是欧元区摆脱债务危机的过程，将是一个长期和两难选择的过程。

欧债危机短期内难以解决，是因为造成这场危机的原因在于结构性问题，而非周期性问题。解决欧元区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将需要较长时间。我担心，欧元区一些经济体，例如意大利、希腊等国，从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算起，恐将面临“失去的十年”。

解决欧债危机的过程是个“两难过程”，是因为解决欧债危机的出路在于两条，一是尽快恢复欧元区经济增长，这是摆脱债务危机的基础；二是进行结构改革，解决欧债危机的源头问题，这是彻底摆脱债务危机的前提。但这二者之间，给欧元区各国政府造成了“两难”困境，即不解决结构性问题，欧元区的经济难以恢复增长，而没有经济增长，又难以推进实质性的结构调整。

这个两难困境的出路，以及解决欧债危机的出路，就在于欧元区各国政府必须就均衡地推进经济刺激政策与财政紧缩措施，达成共识，协调行动。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应该为欧元区摆脱困境，创造有利的国际金融环境，特别是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环境。

记者：近一段时间来，一些主要经济体均实施了不同程度的宽松货币政策，有人担心全球范围内的“货币战”即将打响，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周文重：近来，美欧日央行竞相推行货币宽松政策，无论其动机如何，他们作为三大国际通货的发行者，向市场大肆注入流动性，自然有引发全球性“货币战争”的危险。但现在还不能据此断言说“货币战争”已经打响，也不能说“即将打响”，只是这种货币宽松政策的风险以及竞相贬值的“货币战争”苗头，值得包括美欧日在内的所有国家警惕。

按照我的理解，美欧日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还会持续一个时期，这就给全球经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三大国际通货同时而且持续地增大流动性，必然牵动国际货币汇率体系发生结构性变动甚至动荡，如果这种趋势任其发展，世界经济还能否避免“货币战争”？换言之，现在的危险在于，一方面美欧日政府运用货币政策这只“看得见的手”，持续不断地增大市场流动性，另一方面又任由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自由放任地推动国际货币汇率变动，这或迟或早将带来货币市场的灾难，即货币战争。因此我认为，美欧日央行作为国际通货的发行者，在推行货币宽松政策的时候，必须担负起作为国际通货发行者的国际责任，特别是担负起稳定国际货币汇率体系的国际责任。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积极推进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改革，从制度上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和健康运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亚洲经济呈现出明显的自主性增长特征。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尽管亚洲各经济体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部分经济体出现低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局面，但是亚洲各国很快就摆脱危机的影响，实现群体性高增长。

亚洲能够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一枝独秀，无疑与亚洲区内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在亚洲从区外进口额占其进口总额呈下降趋势的同时，亚洲对亚洲成员国的出口占其全部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亚洲区内市场正在成为亚洲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之一。

亚洲保持这种“领先”的增长态势，主要是其内在的经济发展动力在起基础性作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在未来5年内，亚洲多数经济体仍将比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快，或者至少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

视角

亚洲经济增长凸显“中国机遇”

□ 赵江林

中国应积极利用亚洲这一新生市场的力量，助推国内经济增长与工业化进程。首先，发展中的亚洲将成为中国产品和服务的主要出口目的地。随着经济实力的崛起，亚洲正在成为包括资本品和消费品在内的最终产品进口地区，一方面扩张性的投资需求将会加大资本品的进口，另一方面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正在促使亚洲改变消费结构，中高端消费品市场持续扩大，因而亚洲有可能替代传统的发达国家市场，成为中国未来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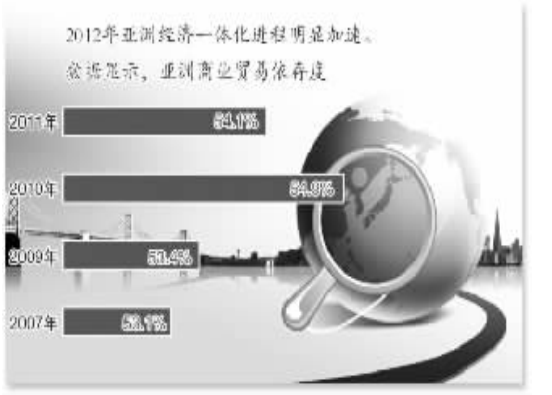
其次，亚洲将有可能成为中国对外投资主要目的地。目前中国以寻求市场为导向的投资并不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中国的投资目的地将有可能出现调整，与亚洲各国建立更加密切的经济关系。

第三，亚洲将成为中国地区制度安排的核心区域。一直以来，亚洲地区的合作进程，尤其是多边合作进程发展不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亚洲作为世界独立的一极的存在。随着与周边国家经济关系的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利益交汇点不断扩大，中国将建立稳定的多边合作制度安排。随着周边国家对稳定的地区环境的利益诉求增强，有助于延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战略机遇期。

同时，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有可能呈现竞争加剧的态势。由于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都有强烈的经济发展愿望，也都在积极获取更多的资源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对资源的争夺、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空间的相互挤压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局面。如何减少因过度竞争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另外，区外大国干预不可忽视。区外大国看中亚洲这一新兴市场，也极力想控制中国在地区中的影响，如何有效应对也是中国应考虑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室主任）

图说



本版编辑 于建东 李红光